



新闻传播学研究前沿 (第一辑)

我国当前社会问题 舆论调控研究

● 韩运荣 黄田园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新闻传播学研究前沿（第一辑）

我国当前社会问题 舆论调控研究

◎ 韩运荣 黄田园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国当前社会问题舆论调控研究/韩运荣,黄田园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657-0172-6

I. ①我… II. ①韩… ②黄… III. ①社会问题—舆论—研究—中国
IV. ①D669 ②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0452 号

我国当前社会问题舆论调控研究

作 者 韩运荣 黄田园

策 划 欣 雯 刘大年

责任编辑 赵丽华

封面设计 魏 东

责任印制 范明懿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30×988mm 1/16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657-0172-6/D·0172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序 言

社会裂变中的舆情态势及问题治理是一个现实而急迫的大课题。社会转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社会的裂变过程,社会位置的差异、多年形成的刻板成见使这一过程充满着隔阂、矛盾、误解、偏见和冲突,而最为社会情势表征的舆情恰是其中最为活跃和富有驱动力的一道社会景观。研究社会裂变中的舆情态势及问题的治理,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置身于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其现实景观往往让任何一个观察者应接不暇。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起步者”,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向者”。中国在同时经历美国历史上的好几个发展阶段——19世纪末期靠巧取豪夺及残酷剥削致富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20世纪20年代的投机金融风潮、30年代的农村向城市移民时代、50年代的“第一辆车、第一套房子、第一套时髦服装、第一次大学教育、第一次全家度假”的中产阶级消费时代,甚至还有类似60年代的社会动荡时期的某些方面。

当人们充分领略社会转型展示其“硬币”光鲜面时,我们也就不能回避其“硬币”的问题面。20多年来平均9%的经济增长率改变了中国,变化是有目共睹的,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里,人们明显感受得到社会经济分化的现实。

大大小小的城市富裕起来,但许多农村地区和老工业区依然贫穷;虽然自己的日子好过了些,但比起那些真正的“富有者”,自己不啻于一个刚刚脱贫者。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加入WTO的头两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收入分配

极度不公平,其中最富有的10%人群收入增加了16%以上,而同期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这表明一些社会群体的收入甚至出现绝对下降。^①一些突出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大家有一定共识。老百姓生活中感受最深的是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生产安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社会治安、社会保障等问题,这客观地反映出改革多年积累了一些矛盾、经济发展后出现了新问题,如改革中的巧取豪夺与官员腐败、增长中的收入分配不公、发展中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且不均,以及普遍的社会信誉丧失、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等。

鉴于此,应对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已成为整个社会的当务之急。也许有人会说,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的重要领域,观照社会问题、洞察社会问题抑或解读社会问题是社会学者的任务,那么,社会问题跟舆论学有何干系呢?

事实上,无论对“什么是社会问题?”的定义有多少歧义,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有一个基本共识的,即社会问题离不开从社会性和问题性两个层面进行探讨,或者说,社会问题的构成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客观上有“问题”状态出现,即对公众有负面性的困扰状态存在;二是离不开公众主观评价及其行为反应。比如交通拥堵,本身对公众形成了一个“问题”性的困扰状态,但很多大城市人们已习以为常,就不是“问题”。再比如,吸烟在某些地方是再正常不过的生活习惯,但在有些地方就是制定严格措施,加以制止的扰民“问题”。也就是说,对“社会问题”本身的确认,离不开社会成员的认知、评判。

因此,无论对“社会问题”本身的认识,还是对社会问题的“察觉”都离不开公众的认知、判断及评价,或者说,离不开舆论的评判。一定程度上,不仅社会问题的确立是一个社会成员的建构过程,社会问题的治理也同样是一个社会成员的建构过程。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传媒因其强大的信息传递功能,不仅具有社会议题的设置功能,同样也具有社会问题的议题设置功能,通过它的这种议题设置,发挥着舆论调控功能,不仅影响着社会成员对社会问题的认知、确认,还影响着社会问题的治理和解决。

既然舆论的一个作用就是不断探索社会新问题,如何通过它的这种议题设置来适时建构社会问题,既能使我国社会转型期既有的制度文明成果与时俱

^① 高世楫《“伟大的社会”:一条路线的坚持》,《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12月18日。

进,不断地更新以提高自己的生命力,同时也能通过凸显我国社会转型期某些社会问题,提高社会问题治理和解决的效率,这不仅是舆论调控功能的现实使命,同时也是本研究立足于我国社会转型期探析舆论调控状况的初衷。

第一章:社会学视野下: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本章对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的概念及相关理论进行了必要的阐释与现实图景呈现。

第二章:舆论学视野下的社会问题。本章对“社会问题”进行了舆论学解读,进而提出了社会问题舆论调控的理论框架。

在此基础上,第三至第十章,分别就当转型期诸多典型社会问题,如“三农”问题、通货膨胀问题,药品供应保障问题、房地产问题、能源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慈善问题、乳品安全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即对各社会问题的现实议程、政策议程和公众议程分别予以梳理,进而选取有代表性的媒体,进行了社会问题的媒介议程的呈现,进而把握社会问题在传媒建构方面的得失,以期为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的应对提供舆论学的解读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喻国明

2011年1月22日

目 录

序 言 / 1

第一章 社会学视野下: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 / 1

第一节 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理论阐释与现实图景 / 1

第二节 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 / 12

第三节 社会问题的治理 / 19

第二章 舆论学视野下的社会问题 / 34

第一节 深度解析:社会问题——舆论的客体 / 34

第二节 社会问题的权宜应对——舆论调控 / 46

第三节 社会问题舆论调控的理论框架 / 59

第三章 当前“三农”问题的舆论调控研究 / 65

第一节 “三农”问题的现实议程 / 65

第二节 “三农”问题的媒介议程 / 75

第三节 “三农”问题舆论调控策略分析 / 82

第四章 当前通货膨胀问题的舆论调控研究 / 93

第一节 当前通货膨胀问题的现实呈现 / 93

第二节 我国 2007—2008 年通货膨胀问题的媒介议程 / 113

第三节 相关问题的呈现与应对策略 / 125

第五章 当前药品供应保障问题的舆论调控研究 / 133

第一节 当前药品供应保障问题的现实呈现 / 133

第二节 当前药品供应保障问题的媒介议程 / 137

第三节 研究结论 / 152

第六章 当前房地产问题的舆论调控研究 / 158

第一节 当前房地产问题的现实呈现 / 158

第二节 我国房地产问题的媒介议程 / 171

第三节 我国房地产问题舆论调控反思 / 181

第七章 当前能源问题的舆论调控研究 / 188

第一节 当前能源问题的现实呈现 / 189

第二节 “十一五”规划期间我国能源问题的媒介议程 / 199

第三节 “十一五”规划期间我国能源问题的舆论调控 / 211

第八章 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舆论调控研究 / 218

第一节 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现实呈现 / 219

第二节 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媒介议程 / 227

第三节 相关问题分析与应对策略 / 234

第九章 当前慈善问题的舆论调控研究 / 243

第一节 有关慈善事业与慈善问题的界定 / 244

第二节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慈善问题的呈现 / 247

第三节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慈善问题的媒介议程 / 253

第十章 当前乳品安全问题的舆论调控研究 / 266

第一节 当前乳品安全问题的现实呈现 / 267

第二节 我国乳品安全问题的媒介议程 / 274

第三节 我国乳品安全问题的舆论调控空间 / 278

参考文献 / 285

后 记 / 289

第一章 社会学视野下: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

有学者坦言“机会的不平等带来了财富的不平等,财富的不平等又带来机会的不平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分化就越来越大。中国已进入‘后危机时代’”。2009年11月5日发布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显示,排行榜上前40名富豪在过去的一年,总资产从520亿美元增加到1060亿美元;中国当今的金融体系呈现了一个“二八”现象,中国二成的富人掌握了全中国的八成财富;一旦基尼系数达到了0.4,就会发生大的经济危机,而目前中国的贫富分化,基尼系数达到了0.47左右,远远超出了目前发达国家的最高水平,而且还在迅速扩大。^①

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经济发展的功绩大部分可以归功于经济学家,是他们的先知先觉帮助整个社会实现了奇迹;而成功地消除社会问题,则更多是依靠社会学家的先知先觉,正是这一点帮助整个社会避免了许多陷阱,缓和了社会矛盾,保持了社会稳定。因此,就当代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有必要先从社会学的视野予以观照。

第一节 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理论阐释与现实图景

本研究针对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即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而论。那么,什么是社会转型?其内涵是什么?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该如何定位?对于这一系列具有连带关系的问题的解析也自然成为本研究的逻辑前提。

^① 《盛世与阴影——关于中国财富的对话》,《南方周末》2009年11月26日。

一、“社会转型”概念与内涵的解析

(一)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的概念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我国,当时,不同学科对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按语义学上的解析,某物因其内部的构成要素以及同外部的各种交换关系,使其有着特定而有效的组合关系,也使该物具有相对稳定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即所谓“型”。当事物内部各组成要素以及它同周围环境的组合关系,或发生空间排列方式上的变化,或增加或减少构成的要素,从而使事物原有的相对稳定的存在方式发生变化,这一过程被称为“转型”,从这一意义上讲,“转型”是从化学领域的“构型”、“构象”以及生物学上的“进化”等词发展而来,转型后的事物,要么变成了他物,要么通过改变结构而增加了新的功能。后来,“转型”这一词被西方社会学界移植到社会研究领域,“社会转型”用来指社会结构的变迁。经济学家则更多关注经济层面的经济体制转型,政治学家更关注政治领域,而哲学家则更经常从宏观、系统文化的角度加以总结和阐释。^①

(二)现代化进程

事实上,社会转型并不是一个泛泛而论的社会变迁的概念,它是与现代化相关的社会转型。也正因为“社会转型”与“现代化”有密切的关系,对于社会转型的理解也就很难绕开对“现代化”概念。现代化进程是指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目前,国际学术界,有更多使用“社会转型”概念的趋势,社会转型已成为表达现代化进程的另一个语词。诚然,二者的内涵有重合之处,但“社会转型”这一概念的出现晚于“现代化”概念的事实,也决定了人们对二者认同上存在某种差异上的约定。

现代化理论的鼎盛时期是在 20 世纪的 50 年代末和整个 60 年代,但从 60 年代末开始,现代化理论便开始不断地遭受质疑。

首先是现代化理论未能从情感上得到普遍的认同。虽然现代化理论涉及现代化过程中极为广泛的问题,但其基本理论主张有三点:“传统—现代”两分法;社会

^① 转引自雷龙乾著《中国社会转型的哲学阐释》,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4—35 页。

发展的内因论;现代化趋同的假设。^①该主张暗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日益遭受批评。那么,提及现代化概念似乎涉嫌误导人们一味盲目地模仿西方经验、不加选择地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意味着未能充分顾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弱势群体,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个欠发达国家立场、经验和民族情感。

其次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发展现实。由于现代化内含的一个逻辑是,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通过现代化实现了当今世界发展水平的最高,那么非西方国家也应设法改变落后的状态,而迎头赶上的唯一选择就是现代化,以此最终成为能与西方发达国家融为一体的现代社会。然而,70年代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如越南战争、经济危机、能源危机击碎了人们畅想的泡影,使人们看到了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的“陷阱”,现实提醒人们“对现代美国式乌托邦必须持谨慎态度,保持距离”。^②

虽然社会转型表达的也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实现历史跃迁的过程,但却避免了把当代社会变迁解释成向资本主义和西方文化臣服的理论片面性和局限性,以及由这种片面性和局限性所导致的现代化实践误区。相比较现代化概念透露的世界性研究视野,社会转型概念则更富客观冷静的气息,同时,也更强调社会变迁有某种社会更新和社会自觉的过程。

二、有关我国社会转型的理论阐释

具体来说,本研究将聚焦于改革开放以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模式的探索和实践时期。有人说,中国的这次社会转型“是一次社会结构的大调整,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跨入的过程,是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的现代文明社会迈进的过程,是把中国区域经济向世界经济体系溶入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相互融化的过程”。^③

但事实上,我国本阶段的社会转型其自身实践所呈现出的迥异于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特征,使我们很难简单地用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语境下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内容来框定它。这些迥异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超现代化

①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② 雷龙乾著《中国社会转型的哲学阐释》,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③ 徐海波著《中国社会转型与意识形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性,二是路径依赖。^①

(一)超越现代化

虽然我们不难约定社会转型主要是描述当代社会历史变革现象,但“社会转型”这一概念的缘起及与“现代化”的渊源,使人更容易关注我国社会转型的现代化特征,即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但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各个层面实践恰恰超越了现代化本身。

1. 经济转型的主题多重性

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与发展都是从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与传统自然经济开始的,对在传统私有制基础上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只需要解决建立市场竞争机制的规则问题,并不存在其他问题。

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我国,经济转型过程的复杂性是所有经历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不曾预见的。也就是说,我国是从自身建立起的独特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再分配体制开始的,该体制是以对资源的高度垄断为前提的,那么,如今我国的经济面临转型时,其主题是从再分配向市场经济转型。“由于中国是在公共资产高存量基础上通过产权制度改革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除了要建立市场竞争的秩序外,更重要的是面临产权或交易初始配置的问题”。^②而事实上,在这场以公共名义持有的资产交易中,由于公众不能直接参与交易,因此,这场交易面临着“卖方缺位”的问题。可见,我国当代经济转型不仅基础有别于西方国家,经济转型的主题也面临着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多重性的现实。因此,可以说我国经济转型的内涵已超越了现代化的题义。

2. 政府转型的权限双重性

一旦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运作机制,社会上大量的事情即会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节,这也意味着一个市场经济的政府的要求应当是一个有限的政府,当好竞争场的守夜者,维护好市场秩序,不要插手干涉市场自身的运作。

理论上讲,经济转型必然推动政治转型,政府也面临着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

^①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② 秦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收入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页。

的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但事实上,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转型是从公有资产为主的基础上进入市场经济的,在此前提下单纯要求一个有限政府是不符合现实国情的。试想公有资产一经进入市场,任其在所有者——公众缺位的前提下自行交易,一个有限政府仅仅维持交易秩序,却对交易结果置若罔闻,那么作为公有资产的公共利益又有谁来保证呢?或者说,如果政府不全权参与,谁能代表公众参与?

可见,我国当代经济转型现实所对应的政治转型面临的不仅是一个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的问题,而是具有双重性。即从政府如何规范、约束市场来讲,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但从政府介入市场交易来讲,其权力是全权的,只不过这种全权是公众委托给政府的全权代理。关键是为了避免市场交易的监守自盗,政府与公众之间必须建立一种严格的委托代理交易机制:“第一,做这种交易,政府要取得公众的授权。第二,政府要接受公众的监督”,“这种公众选择代理,监督交易的机制实际上就是政治民主制”^①。

3. 公民社会的培育与重建

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下,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力,与市场力量形成制衡,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均衡却依赖于成熟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又称为市民社会、民间社会,它是区别于政治国家而有相对独立性的自主社会领域。严格意义上说,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公民对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的追求,而公民社会是公民充分展现这些自主性的社会空间。因此,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现代化和发展的主题是在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上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而我国的发展进程几乎正好相反。

我国在转型前国家高度集权,“公民社会的合法程度非常低,‘民间组织’、‘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从1949年后一直是十分敏感的字眼”^②。在政治上高度一元化的组织和领导体制下,在经济上资源高度垄断的社会体制下,人们的全部社会活动,包括满足物质利益、从事物质生产的活动都由国家安排,并受到国家的严格管理与控制。“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对于不少人来说,‘市民社会,就

① 秦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收入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页。

②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页。

是资产阶级社会,‘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则意味着与政府对立”^①。在社会成员大多依附在城市的单位制和农村的人民公社组织结构中,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权力中心重合,社会分化程度低。应该说,“为了强化对社会的总体性控制,消除任何带有独立性倾向的社会力量就是必然的”^②。

在当代的社会转型期,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为求得经济发展的自由,政府将一些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权逐渐让渡出来,归还给社会。虽说社会已成为控制资源的有力的潜在力量,自主领域的每一次扩大都意味着政治国家控制领域的相对减少,但毕竟当代中国公民社会是在总体性社会体制不断弱化和解体的前提下,逐渐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的,因此正处于生成培育期。

4. 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更新

如果把现代化理解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变迁,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中国的近代即已开启延绵至今。因为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讲,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还是社会主义改革,都是以现代化为基本目标,试图摆脱落后状态向先进状态过渡,并呈现出中国现代性的特征。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也必然与实践相呼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③事实上,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起步、扩展,对社会主义以及现代化认识的深入,具有现代化内涵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处在不断更新的历史阶段。

在最初的社会主义建设期间,作为批判资本主义一极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是以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存在的。“由于现代化理论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理解现代化的基本规范,因此,现代化过程也经常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化过程”。^④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种种“赶超运动”表明“社会主义对现代性的反应是独特的、扭曲的甚至极端的”^⑤。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将中国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接轨,社会主义改革真正回归到现代化目标本身,并放弃了理想主义的现代化方式。当代改革的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作为现代化的意

①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页。

②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③ 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④ 同上。

⑤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与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相比,是“一种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已经不具有前者的那种反现代性倾向”。但问题是,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的感召下,“这种将效率置于一切之首的实用主义,为新的社会不平等创造了条件,也为政治民主化制造了障碍”。^① 自改革开放以来,围绕改革问题的争论就不曾中断过,虽然表现出意识形态之争,但“论争的核心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现代化,而是用什么方式现代化”。

而今,市场社会及其规则日益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保持其现代性的同时,不丧失其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市场本身所产生的社会危机作出相应的分析和批判,这是其继续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关键问题所在,由此,从社会意识形态来讲,我国当代的社会转型也不仅仅关涉现代化,而是如何在超越现代化内涵的基础上的更新问题。

(二)路径依赖

我国当代的社会转型必将是持续整整几代人的现实、制度、文化和政治层面的渐进改革的历程,尽管我们也知道,转型并不意味着社会会让市场力量独自主宰其命运,但当一切变得如此不可预料,我们理应正视这些真实的问题。

因此,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独特的历史定位,应当是发生在 20 世纪最后 20 年以来的社会转型,它有现代化的因素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是共产主义文明的转型。

“共产主义,无疑是另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在其鼎盛时期,曾经囊括了人类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它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非常不同的价值、制度和运作逻辑”。虽然《历史的终结》曾一度把苏联东欧体系的解体看做是西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的胜利,并宣告自由的民主制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后一种社会形态,历史也就在这一时代宣告终结,但路径依赖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转型中继续发挥作用,以及在此基础上社会转型自身的机制与逻辑的发挥均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转型国家在发展道路上与西方国家的重大差异甚至转型国家内部在发展模式上的重大差异,都明确地昭示人们,历史仍然在沿着不同的模式延伸”。^②

① 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 页。

②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1 期。

总之,我国当代的社会转型具有“超越现代化”和“路径依赖”的特征,约定了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与路径,事实上,我国当代社会转型所呈现出的独特实践逻辑:连续性、渐进性及实践先行式的运作路径已明显地向世人展示了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独特的发展道路。

三、现实图景:社会转型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

可以说,社会转型引发社会结构变迁是社会经济分化的必然后果,却难以明说这种分化的方向。对于当前的社会经济现状,即使当今中国的社会学界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们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具有广泛影响的是社会分层理论。

(一)理论背景

长期以来,在阶级阶层研究领域,存在着两大理论流派,一派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另一派是韦伯主义的社会分层研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将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视为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而韦伯主义者则采用多元划分标准——身份(声望、消费模式、生活方式等),经济状况(收入、财富、雇佣关系等)和政治权力。两派学者主要的理论差异在于,前者是一元阶级划分模式,后者是多元阶级划分模式。

马克思主义者与韦伯主义者在阶级阶层研究领域中的争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但近30年以来,由于社会历史的激剧变迁,两派学者都对传统理论观点加以修正。新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极划分,采用多元指标进行分类;新韦伯主义理论家在划分阶级或阶层时把经济指标——如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雇佣者还是受雇者——作为重要的分类指标。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研究技术的改进,后来者们越来越超越传统的派别之争,一定程度上来说,二者的阶级阶层划分标准和最终划分出的结果日益趋近。不同点只是在研究目的和关注点上,马克思主义者由于还保持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注而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而韦伯主义者的研究更重视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和准确把握。^①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其阶级理论也被奉为主臬。以此为指导,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供了中国社会各阶级

^① 李春玲著《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8页。

的划分标准,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奉行阶级斗争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成为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的核心部分,逐渐由一种普通的方法演变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至尊方法,其方法价值经常为其意识形态价值所掩盖。^①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由于阶级斗争思想路线的终结,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划分标准也相对失去了社会阐释的有效性,“阶级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社会禁忌。事实上,不论是阶级概念还是阶层概念,都译自英文“Class”,阶级与阶层之分很大程度上出于我国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需要。^②

可以说,中国的阶级、阶层理论研究既没有传承国外社会分层理论的发展脉络,也没有建构起自身较为完善的社会分层理论体系,学者们只是从客观的现实出发,依据特定的标准,就中国当代社会的分层现状在实证领域获取一些局部的研究成果。当然,分类标准既有传统阶级阶层分类模式的延续,也有新马克思主义与新韦伯主义的影子。

(二)代表性观点

近年来,就中国当代社会是否“两极分化”,中国当代社会结构是否“定型化”这两个问题,中国当代阶级阶层理论研究的主要代表性观点仍存有争议。

1. 中国当代社会是否“两极分化”

肯定的回答是“断裂化”观点。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孙立平提出中国社会结构特征“断裂化”。其基本观点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出现了社会资源继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扩散”转至向少数人手中积聚的演变,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相互隔绝、差异鲜明的两部分——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尤其目前出现的精英联盟——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相互结盟更强化了这种趋势,他们之间的利益交换以及共同垄断资源分配,导致了精英集团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对立。“断裂化”实际上表达了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居于上层社会的少数人掌握着社会绝大多数资源,而处于底层的大多数人生活境遇持续下滑。“断裂化”观点虽然仅仅是理论上的预见,并未提供实证的经验论据,但无论是对学界还是社会决策层而言,“断裂化”的社会预见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警示意义。因

① 李承贵著《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② 沈晖主编《当代中国中间阶层认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